

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

宋越倫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

宋 越 倫 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究必印翻

有所權版

版初臺月二年五十五國民華中
版一修臺月八年八十六國民華中

史流交化文族民日中

角二元一 價定本基 冊一全

(費滙費運加酌埠外)

倫	越	宋	者	著
譽	元	黎	人	行
局	書	中	正	刷印行發

維(4882)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
(500)

局書中正

(CHENG CHUNG BOOK COMPANY)

號十二路陽街市北臺海臺：址地

(Address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)

3821147: 話電部審編 3821145: 話電室理經

3822214: 話電部市門 3821153: 話電部務業

號四一九九: 機劃政郵

銷經總外海

(OVERSEAS AGENCIES)

司公書國成爲：銷經總港香

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：處事辦總

3—886172—4: 話電

店書風海：銷經總本日

地書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：址地

291—4345: 話電

店書海東

地書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：址地

791—6592: 話電

司公書國成爲：銷經總國泰

號233路力華堪谷曼國泰：址地

司公書國強：銷經總國英

(Address: 41 Division St., New York, N.Y. 10002 U.S.A.)

司公書國華英：銷經總洲歐

(Address: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.1, England)

司公書國華高：銷經總大拿加

(Address: China Court, Suite 212,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.)

Ontario, CANADA M5T 2C2

再版序

拙著「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」一書，自出版以來，出乎意料地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普遍的重視，在日本方面，幾乎每一次國際文史人類等學術會議，均直接間接地引述了其中有關吳越地區與日本古代文化關聯的看法，給日本先史時期的稻作文化以及日本民族來源問題，投上了一個巨大的波紋——在人類學方面，兩三年來日方多數學者都從各種角度，逐漸由「北來」「土生」「混血」等大正以來聚訟紛紜的說法，將其焦點移向吳越地區，認為大陸民族的影響，實為大和民族形成的骨幹，至于稻作文化，則無論東西兩學派，都已一致地承認了吳越地區傳入的確實性。

兩年前世界東方學者會議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舉行，著者也因此書特別受到各方的重視，雜在十一人日本古代史的權威學者中，發表了一篇以本書為主體的古代中日關係的論文，結果在歐美學者之間，也引起了極大的反響，主持日本部份的霍爾(Prof. John W. Hall)教授，對此尤感興趣，認為在過于重視實證主義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現狀中，不僅提供了無數極為重要的指針。且可因此提醒多數日本史的學者，對古代中國史書以及民族學的重要性，重作估價。

兩年以來，著者常有機會在日從事學術演講，當初以為僅能作為一時臆測的各種要法，竟能普遍地得到過份的褒譽與評價。尤其值得興奮的，則是海外各地僑胞的反響，兩三年來常有多數散居各國的熱心讀者，來信勉勵督促，希望能夠繼續寫點有關中日兩國交流的東西。隨着最近日本國際地位顯著的提高，以

受盡日本軍國主義荼毒以致戰後流寓各地的僑胞，其想從根柢澈底瞭解日本的心情，不僅可以充分體會，也且使人倍增感慨！

在國內方面，更是經常得到多數先輩友人的激勵和獎勉，而且還蒙嘉新文化基金會頒給了民國五十六年度的優秀著作獎，這在學殖粗疏，終日爲公務所牽纏，無法認真治學的著者，實在是無比的惶恐和榮譽。目下此書正由九州大學教授熊谷治博士親自逐譯，不久將來，日文本即可問世，當此正中書局準備將本書再版之際，僅以興奮感謝的心情，撫拾所感，以爲之序。

五十八年一月

宋越倫

序于東京
深大寺

宋著「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」評介

島田正郎

編者註：我駐日大使館文化參事宋越倫所著「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」一書（正中版）發行以來，極爲日本學術界所重視，多數東方學者，對之尤多好評，最近東洋史學會與國策研究會聯合主辦之讀書會中，日東洋史權威明治大學法學院院長島田正郎博士，對該書曾有評述，認爲此書于日本文化起源解明之研究，實有劃時代之貢獻，而于日本學界，無異注入一種「新風」，其評價之高，出之日本學者，實屬難得，茲特將島田評述原文，逐譯如下：（原文刊載於「新國策」旬刊六月廿五日號）

一、民族對民族之交流

在本書卷首，除了本人的序文，尚有中國文化學院董事長張其昀先生的序文，在張先生的序文中，曾經說明日本對於中國學（漢學）的研究，極爲鼎盛，而與此相反，在中國研究「日本學」者，連最基本的綱目亦未確立，此在中日兩國의 各種交流上，實爲最大障礙。本人對此，誠屬不勝同感，在日本，如所週知，「中國學」的研究，分門別類，發達已極。原來日人對中國古代文物之特別關心，已成爲一種教養上必不可缺的風習。但此在中國，一般對於日本歷史文物，關心却甚薄弱，尤其在學問的分野上，中國學者所從事學術性的日本研究，雖謂之絕無僅有，亦非過言。

雖然在戰前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出的中國文化叢書中，曾有「中日交流史」的出版，最近臺灣有陳蓬水其人，以中國文化對日本之影響爲題，撰爲論文，在國立政治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，但僅就此等極爲例外的著作而論，其內容亦僅能局限于進入歷史時代以後的若干環節，且純然以中國的立場，敘述中國文化對於日本的影響。

宋越倫先生所著「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」一書，誠如其書名所提示，與其說是國家與國家的交流，毋寧以民族對民族的問題爲重點，加以研究闡發，因此本書對於日本國家形成以前的問題，亦佔了相當多數的篇幅。

二、對於日本文化起源解明之貢獻

就本人的學術立場而論，雖爲從事於廣泛意味的「中國學」的一份子，但本人最大的關心的分野，在時間以及空間的制限上，實較偏頗，因爲本人的專門爲中世的遼金法制的研究，因此對於宋著實不敢提出專門性的評價。與宋氏從事同樣研究的日人專門學者中，如果應許我提出若干權威學者的話，那末我首先就得介紹上智大學的白鳥芳郎教授（白鳥博士爲著名東洋學權威白鳥庫吉博士之孫）白鳥教授主要根據中國的史籍，以民俗學的資料爲基礎，從事於人類學的研究，另一位學者則爲從前人未蹈的角度出發，從事於中日關係史研究的學習院大學市川健一郎教授。市川教授主要從中國南部（揚子江以南）的考古學的研

究，從事中日關係的考察與發掘。

所以要對宋著從專門的立場加以評論，自以首先徵求上述二氏的意見，最為適當。本人既蒙貴會之囑，對宋著加以評述，所以特於事前走訪二氏，以聽取二氏對於本書的意見。因為我對此一領域並非專門，如果所持見解與專家看法發生齟齬，則在本人實為一大僭越，所以為了慎重，特別採取了以上的步驟。現在且就本人所見，就本書內容的三大意義，加以陳述。第一，中國的一般民衆固不必說，即令知識份子而言，對於日本的知識，亦極貧乏。本書對此，正係著者的意圖所在，旨在對於同胞的廣大啓發。第二，目下日本研究者所最注目之焦點，（不論其從事研究的專門分野為何）凡是以廣泛的意味，從事研鑽歷史的日本學者，其最大關心，莫過於「日本文化的起源」，亦即是「日本文化形成」的問題。在這方面，日本的學者如就其專門的分野，提出衆多的意見。此在戰前，由于種種限制，此種研究事實上無人敢于正面提出，迨至戰後，此種學問上的桎梏盡去，所以對於日本文化起源問題的探索，日本學者已能從各種立場，加以研究。特別值得對宋著表示敬意的，莫過宋著在此一方面的偉大的貢獻。

三、貴重的著者的生活體驗

著者為揚子江沿岸（江南）的出身，在弱冠前後到日本留學為止，著者大部分的時間，均在故鄉消磨，直到今日為止，在學術上最為遺憾的，無論中國以及日本，對於長江沿岸的學術的研究，均極貧乏，如所週知，中國文化發祥于黃河流域，至于長江流域的開發，則為在相當時期以後的事情，因此在漢族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播以前，長江流域之有土著文化，應為當然之事。關於此種土著文化的研探，中日

兩國學者均因種種困難情勢的掣肘，雖明知其重要，直到今日，猶難獲得滿意的結果。此一事實，對於「日本文化的起源」，及至日本文化形成問題的研究與開拓，實爲最大的障礙。此在本書著者，由於其生長在此一地域（亦即爲吾人所熟稱的吳越地區）對於此一地區現存的古來的民俗的風習、習慣、年中行事等等，換言之，亦即爲長江流域的風物，著者自幼即以其敏銳的感覺，加以體察，在基本知識上，具備了一種豐富無比的寶庫，在進入學問生活以前，著者在其成長過程中有此貴重的體驗，實爲任何日本學者所不及。

我等外國學者，於研究中國文獻之際，其理解之程度，實有限界。與此同時，雖云中國的學者，欲其對某一中國特定地域之風物，從文獻加以理解，實亦有其掣肘與限界。在我等日本人學者之中，如其出身爲東北（指岩手、青森、福島一帶地區），或北海道，而欲其對鹿兒島的風物從文獻上加以理解，雖然在文字的解讀或無困難，但由於其缺乏現實生活的體驗，欲其完全消化，實不可能。就中國的全體情形而言，雖具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文化圈，但其地域的差異與特殊性，則甚明顯。對於此種地方的文化，中國學者苟非出身於同一地域，則其理解之有限界，自屬當然。

就此而論，著者的長江沿岸的生活體驗，實在非常貴重，尤其當著者以其從幼的感受，將長江流域的文化與日本文化試作比較之際，其「着想」實極珍貴，此事不僅對日本學界吹入一股「新風」，且將使今後在此一方面的研究，開闢一前人未蹈的新的途徑。

雖然，此書對此種「着想」，在實證上是否完整無缺，則在本人亦不無疑問，但在啓蒙的階段，如對

本書過作苛求，事實上實無理由。

四、吳越地區與日本文化

茲願就著者的「着想」，提出若干環節，以證明本人的看法。如所週知，日本在繩文式土器時代至彌生式土器時代之間，具有一大文化的斷層，繩文式時代從事狩獵、漁撈，其生活主要依存于「天然物」，而彌生式時代則非常明顯地為「水稻栽培」業已開始的時代。所以在此二大時代之中，有一文化的「斷層」，此一「斷層」應如何加以解釋彌補，實為學者所最關心之事。

如果吾人再將問題加以縮小，則日本水稻技術的傳入，究係來自何方？此一看似簡單的問題，至今猶聚訟紛紜，無法解決。當然，迄至今日為止，稻之原產係屬南方（指南洋馬來一帶），但移入日本之水稻，如遽認為係南方直接傳入，事實上實屬武斷。（按日本若干學者，亦有南方直接移入之主張）蓋在日本彌生時代的石器之中，已有石刀（Stone Knife）之存在。當時稻之收穫，並非如今日之從稻根割取，而僅摘取其禾穗部份，在今日東南亞一帶的水稻耕作中，依然遺留了此種「摘穗」的收穫方式。但彌生時代所遺留的石刀，係具有半月形的形式，從兩側削入，正中有孔一至二個；此種形式的石刀，在華中以及華南地區，並未發現，而在華北以及朝鮮半島南部，則有大量發現。原來在日本研究家之間，多認為日本水稻的傳入，係先由華中，華南以至更南的地區，不知為何，直接傳入朝鮮半島，在朝鮮半島與北亞細亞文化相融合，於是與石刀一併傳入日本。

如以土器爲例，繩文式比較厚重，在原坯尚甚柔軟之際，以繩加以捲紮，於是乃有繩形的紋樣，燒製此種土器，溫度較低，但彌生式係屬高溫燒製，且較堅實，而無紋形。故在性質上爲一種適合于實用的土器。與前述之石刀同樣，此種彌生式土器，亦與朝鮮半島南部的土器，具有同樣的形式。

由于上述種種理由，對於日本文化的源流，尤其是對於彌生式文化，日本的學者多認爲是應當與大陸的北部相結合。

但在本書著者，則認爲稻作等其他文化，極有可能係自吳越方面直接傳入日本本土；一般的想法，以爲海的阻隔，最足妨碍文化的傳佈，殊不知一旦能製造船舶的民族，海上交通之便利，較之陸上不知要方便多少倍。雖然，在吳越地區與日本本土之間，雖有相當難航的東中國海的存在，但卽令是原始的船舶，渡航亦非不可能之事。

五、從年中行事、風俗習慣的共通性着眼

雖然，此種着想極爲重要，但在目前階段，水稻之由吳越地區直接移入日本一事，尙難作確定性之實證，在最近出版的「考古學雜誌」三月號中，慶應大學的考古學專家江阪輝彌氏以「稻作文化傳來有關諸問題」爲題，發表論文，其着想頗與著者近似，其種種論述，對吳越地區直接傳入稻作一事，論述極爲詳析，但此一新說，欲求全面證實，則似尙需相當時間。

我在這裏指出稻作直接傳入日本一事，尙未得有具體實證，這對著者宋氏實覺失禮，因爲宋氏在本書

中並非對此完全不求實證，與此相反，宋氏對此事之求證，却係置其重點於吳越地區（長江流域）進入歷史時代以後之「年中行事」以及風俗習慣的與日本的情形排比對照，加以分析。因為農業國家，像「年中行事」的民俗有關的項目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，同時，就本人從事法律史研究的立場而言，「年中行事」所佔地位亦至重要，著者以長江流域年中行事中的若干事實，與日本各種年中行事，特別是宮廷行事，加以研究比較，以求證明吳越地區之與日本的關聯。

此一方式，實為極具意義的「着想」，其見解頗值欽佩。但從專家的立場，如果光從現象面加以排列比較，以其相似點直接接合，而欲證實文化的關聯性，這實在尚須從其他角度，加以多方探討，始可期於萬全。如以端午中日雙方均食用米粽為例，日本晚近的米粽，與中國的米粽是否同源，尚待研討，像年中行事那種抽象的現象，與現存的風俗習慣連貫結合，如無種種的材料加以檢討摸索，往往難期週全。但由于此書的目的另有所在，欲求著者將其心胸的豐富蘊藏，全部提出，事實上實無可能。

六、「征服王朝學說」之介紹

本書第二值得注目之點，則為日本歷史上中國系歸化人問題，以及此種中國系歸化人所扮演的歷史的任務的研究。在日本的黎明期中，由前述的繩文時代，經過彌生時代，接着是古墳時代的到來。由于宏偉古墳的出現，使人很容易想像當時必具有極大權力的豪族的存在，為其背景。此種豪族逐漸壯大，曾幾何時，就成了日後的天皇，而日本國家，亦從此由雛形而發展形成。

關於此事，日本戰後有極具興趣的見解的發表，此種見解，認為日本的王朝原為「征服王朝」。日本的天皇世家原為北亞細亞的民族，亦即所謂「騎馬民族」。此種民族由朝鮮半島渡海，將日本原住民征服，然後建立的王朝，即為日本以天皇為代表的王朝。此一見解，其着想殊值注意，但從考古學、民族學以及歷史學的各種立場，至今尚難求得實證。

舉例言之，從考古學的發掘，知道日本于進入古墳時代以後，突然發現有馬的存在，多數騎馬所用的道具，輒近多有發現。在彌生時代是否已有馬的存在，實難武斷，但至少將馬作為騎乘或使役（如曳車耕耨），則尚在古墳時代開始以後之事，由于古墳時代之馬具的突然出現，這使戰後一部分學者「北亞細亞騎馬民族」入侵日本之說，得以發揮。

同時，從歷史的立場，日本王朝成立未久，其基礎尚未十分確立之際，突然對於南朝鮮作過一大軍事行動。此事究應作何解釋？一部份學者認為對於當時強大的中國，在日本北九州與南朝鮮，可能有一個所謂「倭韓聯合政權」。

從此一推斷，則對於歷史上彌生時代與古墳時代中間斷層的解釋，頗可以征服王朝之說，加以說明。對於日本專門家在此一方面的見解，本書曾有詳細介紹，就本人所知，在日本學者之間，最近之有「日本王朝」即為「征服王朝」之學說一事，實以宋氏透過本書向中國廣大讀者介紹，為其首次。但著者對於此一學說，尚未加以評述。

七、中國系歸化人爲政治流亡者

著者之重點，於介紹征服王朝之說以後，特別對日本今後在國家形成之過程中，由中國大陸陸續進入日本的多數中國系歸化人問題，加以各種的研究與考察。在此場合，著者的見解使人最感興趣的，即爲何以在此一時期，由中國大陸「歸化」于日本的人數，竟如此其多？中國系的歸化人，自四世紀至七世紀，尤其是六、七兩紀，人數最多，著者對此一問題，特別在中國當時的政治情勢，亦即是大陸的政治的混亂中（日人所謂家庭糾紛）求取其理由，換言之，亦即是多數前時代的人民，由于政權的變化，不得不大舉逃亡日本，以開闢新的天地。此一見解之提出，實值日本學界的重視與傾聽。

與此同時，實際上當時由中國大陸大規模移入日本的歸化人之外，尚有爲數甚多的朝鮮半島的人民，亦同時移入，在民族系統上，此種由朝鮮半島移入的人民，究係韓族或爲漢族，直至今日，尚有甚多疑問，原來當時朝鮮的情勢，尤其是北朝鮮方面，自漢代以來，即爲中國的殖民地，在目前平壤一帶，即爲當時樂浪郡的故址。所以當時在北朝鮮一帶地方，中國的官府經常駐紮。在同一時期，在日本成立的政權，事實上以朝觀樂浪郡的中國官府，作爲朝觀中國王朝的常套手段。當時倭人甚少直接前往中國首都，而以朝觀樂浪郡守，以盡其對於中國王朝的禮儀。在樂浪郡一帶，當時有相當多數的中國人的居住。但隨着韓族的勃興，此等大陸漢人難免感受壓迫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形，日趨混亂，由于上述兩種因素，原駐北朝鮮一帶的中國官憲，於窮途末路之際，大舉移居日本，此一事態，自屬可能。

在著者的論述之中，對於歸化人的看法，在原則上計有兩類，即第一類是爲了逃避中原政治的混亂，由中國本土，直接亡命日本；第二類則爲原駐朝鮮半島的政治機構的官憲，亦由于王朝變更，歸途斷絕，勢亦不得不在新政權的統治者到達以前，湧向日本，以求安全。

著者此種「着想」，實值重視。爲了證明此種可能，著者以明朝鼎革之際，多數明朝遺臣，爲了不願受清朝之統治，多數均逃亡日本爲例，加以說明。在明朝遺民之中，有朱舜水其人，以一大儒學者的身份，受水戶藩戶德川光圀禮聘，爲其賓師。此等人物，對於德川時代的政治、法律、以至儒學，均有極大的貢獻。就本人而論，島田系的祖先原來也是明末遺臣，原爲張姓，明末由雲南亡命日本，在加賀藩擔任藩儒（按加賀藩即今日之石川縣，島田博士世居石川。）這在本人的家譜中留有記錄，所以與本人祖先同樣的情形，由中國亡命日本的，一定爲數極多。質言之，由于大陸王朝的易手，多數遺民之不願受異姓的統治，大舉逃亡國外，其事極爲顯然。從此種事實，著者推斷四世紀至六世紀大陸混亂時期的情勢，亦與此同樣，勢必大規模發生，所以不惜利用各種資料，加以說明，以證明當時中國系歸化人的成立，係由于此種大陸政治混亂所致。

著者對於中國人渡日以來，通過政治、文化以及經濟等各種範疇，在日本國家成立期中所予的貢獻，主要的運用日本方面的文獻，加以實證。

著者以其廣博文獻的知識，將歷史上中國人在日本文化上所寄予的偉大的貢獻，不厭煩詳地對今日中國的同胞加以啓發，光就此點，著者功蹟之大，雖謂之前無古人，亦非過言。

八、漢八與七著日人的同化問題

但遺憾的是，由于本書篇幅的限制，其論述範圍，自亦有其限界，換言之，著者在本書中主要係以文化為重點，多所發揮，至于中國系歸化人在政治的以及經濟方面對於當時日本社會的貢獻，則論述較少。舉例言之，日本古代都城的構築，以及各地「國分寺」的建築，幾無不假手于歸化人之手，始得完成，此種事實，在今日日本學術界業已明白獲得證實，但由于時間以及篇幅的限制，著者在這一方面少有論及。

另一方面，對於此等歸化人與土著日本人之間，以何種形式，融合同化？兩者有何關聯？在長久的歲月中，此等歸化人又如何在日本社會中埋沒生根？著者亦未能詳細論述。當然，對此等問題的研討，事實上實亦有其甚多的困難。作爲一個歷史家，許多方面都受限制，原來歷史學者的任務，係在根據殘存的文書，始可進行研究，所以如果沒有記錄，則除了說是「無法瞭解」以外，別無他法。本書的著者對於文獻稀少的土著日本人與中國系歸化人之接觸問題，以及中國系歸化人在日本土著化的過程，因此亦幾無論及，這在本人實覺遺憾。

爲什麼本人提出此點，其理由是著者在古代日本國家發展的事象上，其研究方式，係採取了歷史時代甚至較爲近代的事例，加以相比類推，以求實證的極爲賢明的方法，如以稻作問題爲例，著者從稻作文明的傳佈中，提起了吳越與日本的直接交流問題，更從歷史時代以後的兩者的年中行事，抽取其類似性，以求實證，又如歸化人的問題，著者也採取了明清政權更易之際，明之遺臣大舉亡命日本的事實，以推斷

四、五世紀的歸化漢人，亦由于同樣的原因，東渡日本。於此，本人實亟願聽取著者對於歸化漢人與日本土著之間，究具何種關係的意見，同時，對於近世華僑問題，據本人所知，著者蘊蓄甚富，其未能在本書中加以發揮，實值遺憾。此等華僑，於移住至文明程度較低的地區，往往非常迅速地吸收當地的土著社會 (Native Society) 的精華，而形成其華僑的獨立的社會。以目前東南亞的情形而論，華僑在經濟的、文化的以及社會的各方面，均能建立獨自的世界，成為經濟的指導者。但此等華僑一旦到了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，如美國日本等處，則往往與原有社會比較隔離，而自劃範疇，成立適合于華僑的特殊居留地。例如橫濱的「南京街」，「中華街」，舊金山以及其他都市的唐人街 (China Town)，均以不同于移居地的特殊區域，以保持其固有的生活態度。質言之，在文明度較高之處，華僑全體不求與土著同化，而以較小的範疇，形成牢固的華僑社會，以維持其固有的傳統。如上所述，其移居地如係文明度較低之處，華僑反而相反地吸收整個「土著社會」，將原有低度的文明，遽加提高，然後建立其本身的經濟的、社會的地位，以求高度發展。此種趨勢，本人以為近世以降的華僑，其動向大致如此。

因此，當四、五世紀之際，日本社會與中國社會之比較，其文明度的相差，實不可以道理計。所以當時移入日本的高度文明的中國人，甚有可能於最初時期，形成獨特的社會，多數且以從事文書的記述以及官衙的主持為其主要職業，但為時不久，即因上述理由，此輩歸化人即與原住民水乳交融，將土著社會全體的文化以及經濟的水準，加以充分提高，因此漢人與日本人在人種上的區別，不久亦告消滅。

在此種過程之中，著者如能運用其特殊的方法，即「以今例古」的方式，將當時歸化漢人在低度日本